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4

湖南人民出版社

编辑说明

一、我省文史工作近年有较大发展，各地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已达数十种之多，其中不乏优秀篇什，弥足珍贵。但由于这些选辑大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作用的发挥，所以，将一批质量较高的史料选编成辑，公开出版发行，就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二、本辑荟萃了二十八篇文章，均系“三亲”史料，分军政、工商经济、文化、宗教、人物等五个部分，并在文尾注明了出处。

三、限于篇幅，本辑不可能将所有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一一选入，所刊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篇目，并不全面。

四、选编者对部分文章的标题（包括小标题）作了适当的改动和调整；在文字上对所有文章也进行了必要的修饰或删除；并订正了部分史实错误。

五、本辑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各地政协文史机构的支持与协助，在此特致谢忱。

目 录

军 政 史 料

- 湘潭镇压劣绅晏容秋始末 龚业光 (1)
- 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记略 陆承裕 (4)
- 对日俘的处理—对汉奸的惩办—沦陷区游击队和别动
军的结局—王耀武在接收日军物资中的贪污情况
- 衡阳抗战纪念城定名的由来 罗铁恕 (10)
- 我在邵阳当县长 徐君虎 (14)
- 除旧布新 拒绝党团干政—遣散饥民回乡生产 恢复
县城秩序—整顿发展教育事业—选贤任能—剿抚兼施
清除匪患—永和金号惨案—严禁赌博 逮捕陈光中—
炮兵学校特务营贩烟案—惩罚地主田顺生—横行乡里
的李老太爷—国大代表选举纠纷—反对内战 拒不屈
兵建碉堡—上瑶山 平冤案—邵阳乡村工业示范组—
我亲自处决的案犯—惩罚一批嫖客—告别邵阳
- 参加组建江南地下第四军的回忆 言乃克 (32)
-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 彭煊容 (49)
- 事变序幕—姑息养奸—血酒结盟—“三·二”浩劫—
风波未平—接受招抚—绥靖会议—酝酿应变—沅陵受
训
- 一九四九年冬黄杰入越纪实 老 兵 (62)

工商经济史料

- 八十年瓷业生涯自述 荣庆祥 (71)

- 涉足瓷业—初见成效—探索长石质釉—改进“紫金釉”—研制工业瓷—精心授徒—老当益壮—寄语同行
- 城陵矶海关忆述 董舜卿 (87)
- 华晶玻璃厂的经历与变迁 易正文 (89)
- 由学徒到老板—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战争造成的不幸及其后—企业走上了新生之路
- 外商在岳阳的经营概况 钟敏政 (97)
- 外商在岳阳销售煤油业务情况—外商在岳阳销售车糖业务情况—英商英美烟公司在岳阳经营情况
- 我是怎样经营雄磺发财的 陈少泉 (106)

文化史料

- 回忆《正中日报》在衡阳时的往事 叶 浓 (110)
- 《正中日报》的创办和组织机构—访问白崇禧和蒋廷黻—田汉同志的教诲—与黑暗进行斗争
- 一个女艺人的遭遇 尚星云 (116)
- 两次拜师学戏—艺无止境—与田汉的接触—落入大恶霸柳森严的魔掌—新生
- 我与巫家拳 黄福祥 (127)
- 拜马道人为师—巫家拳的历史和特点—拜师学戏—继续习拳—用巫家拳惩罚恶老恶少—逃脱了贺屠夫的魔掌—解放后的几段经历

宗教史料

- 我的出家 刘绍宗 (138)
- 出家的原因—自在庵的形式—寺院的人事系统—寺院的生活及制度—寺院的节日和盛会—自长沙回湘潭—

湘潭沦陷时期—和天主教的矛盾—解放后的生活

人 物 史 料

- 忆父亲白石老人的几件事 齐良末 (150)
- 教育家瞿方书生平 瞿国情 (154)
- 府试名列前茅—从事民主革命—致力于教育事业—严于教子
- 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传略 周祖谟 余淑宜 (159)
- 回忆马宗霍先生 马积高 (166)
- “读书略识字”—戒“陋”—强调读和写的基本功—严中有宽
- 我所知道的美籍华人姜逸樵博士 袁政德 (172)
- 回忆画家张一尊 吴佩君 (177)
- 忆张平子先生二三事 田翠竹 (184)
- 我与谢冰莹 谢翔霄 (189)
- “湘西三杰”之一周朝武轶事 徐君虎 (195)
- 我所知道的陈渠珍 孙锡华 (200)
- “保境息民”效法阎锡山—扩充军队—交出军权—在抗战中建设湘西—结束语
- 伯父龚浩事略 龚应红 (210)
- 回忆父亲刘岳厚 刘笃平 (214)
- 与何键分道扬镳—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创办《开明日报》—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湘潭镇压劣绅晏容秋始末

龚业光*

一九五六年九月，全国政协致函湘潭市政协，因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湘潭杀了劣绅晏容秋”，询问有关晏的罪恶历史。为此湘潭市政协邀请部分知情人进行了两次座谈。现根据记录，并参看有关材料整理出以下内容。

晏容秋出生于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其父晏汉生曾在湘潭城内开设晏立成钱庄，兼营粮食业，并勾结县衙门的胥吏承包田赋。清代征收田赋，完全由胥吏和劣绅豪强操纵，鱼肉人民，弊害极深。特别是所谓“劫粮”，即派差进乡，借口催收未完纳的田赋，或尚拖欠的尾数。每当差役进门，农民就得称肉、打酒、杀鸡……仿佛是一场横祸。常有比应缴田赋数额增缴数十倍仍不能了结的事。其实此项所谓欠缴田赋，已由承包商代缴，取得赋券，等到限期一过，再勾结胥吏，遣差役横征暴敛。这种苛政，一直延续到土改时，才得废除。晏家就是凭这种手段致富的。晏容秋继承了这种封建剥削的传统，比起父辈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国初年，晏立成钱庄歇业，晏容秋以律师的名义活动于社交场所。他勾结官吏，颠倒是非，欺害善良的老百姓，并在各

* 龚业光建国前曾任湘潭县政府主任秘书，现年八十六岁，为民革湖南省委顾问。本文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根据部分当事人的座谈回忆整理的。

项公共事务中，极力扩展其个人势力。他当上了县团防局长，并管理县劝学所和文庙的教育经费，以及育婴堂、皆不忍堂的慈善事业经费。一九二三年，杨昭植和彭公达在湘潭设立湖湘学校和平民夜校时，晏容秋就在经费问题上多方刁难。一九二五年六月间，革命浪潮已波及湘潭，杨昭植等策动泥木、人力车、理发、染织等业工人筹组总工会，晏容秋唆使商人反对，又勾结县政府出面干涉，致使总工会未能及时成立。一九二六年七月，晏容秋与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向寅亮等组成湘潭县农会预备会，企图阻扰正在酝酿中的县农会的成立。由于各乡农民不予响应，阴谋未能得逞。

晏容秋利用团防局长的身份勾结土匪，坐地分赃。他有个亲戚住在乡下，被土匪抢劫，特来县城找这位团防局长帮助破案，并住在晏家。晚上，这位亲戚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他看到一大批人给晏家送来了不少东西。次晨，他走去一看，原来这些“礼物”中，有许多竟是他家中被劫去的财物。他目瞪口呆，不敢声言，一直到晏容秋被镇压后才说出此事。

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湘潭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一九二六年秋，湘潭锡箔业工人成立了锡箔业工会。在县总工会的领导下，他们向湘潭县政府控诉晏容秋残酷迫害工人的罪行。晏容秋于一九二四年雇用江西工人私设锡箔工场。因亏损，强迫解雇工人，却不肯按照雇用合同规定期限发足工资，引起纠纷。晏容秋又勾结官府，派差押送工人回籍。工人遭受冤屈，沿途备受虐待，多有死亡者。根据省工农代表大会提交省政府公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判处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的规定，迫使县政府将晏容秋关押。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湘潭县总工会和农会，在湘潭县城内学坪，召开公审晏容秋大会。各工会、农会代表，扛着红旗、梭标、马刀，拥到会场，四通八达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先

由部分工农纠察队到县署迫使县长田镇南将在押的晏容秋交出，并到会场主持公审大会。当晏容秋被押出县署时，署前空坪中已聚合群众数千人，并搬来方桌三张，架叠起来，将晏容秋跪在上面，高呼“枪毙晏容秋！”最后纠察队力排众怒，将晏容秋押至学坪会场。

大会由田镇南主持。首先由锡箔工会委员长张吉生上台控诉晏容秋欺压迫害工人的罪恶事实。接着，许多工人愤怒揭发晏容秋的罪行。当时“打倒土豪劣绅！”“正绅站出来！”“枪毙晏容秋！”的愤怒吼声，震撼了整个湘潭城。

当群众一致要求立即枪毙晏容秋时，田镇南却推说要先请示省政府。这时大会总指挥阎应侯在台上向群众宣布：“已向省政府请示，省府批准判处晏容秋死刑，就地执行。”一时群情鼎沸，口号震天，群众将晏容秋推拥到学坪中，执行了枪决。

晏容秋被镇压后，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县总工会和农会，向湘潭县政府建议召开各界座谈会。会议由田镇南主持。杨昭植在会上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镇压土豪劣绅的意义，以及正绅站过来的政策精神，鼓励大家同心协力，站在革命事业的一边。至此，湘潭的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高涨。

（原载《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

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记略

陆承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十五日日本政府命令侵华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就地缴械投降。蒋介石命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负责湖南区的受降任务。八月十五日，王耀武派其副参谋长罗幸理率第三处课长蔡仁昌及翻译、工作人员、警卫、报务员等十余人，为受降先遣人员，持王耀武要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立即缴械投降的命令，从芷江机场飞往长沙与日军协谈受降办法。十六日，王耀武偕同美国派驻第四方面军司令部联络官主任伍任德少将（译音）、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陶富业及工作人员十余人，乘美机飞往长沙，并令第十八军就近迅速进驻长沙接管城防。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向王耀武举行了投降仪式，递呈了投降书，接受战犯管制，并指定其参谋长一知川少将担任与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负责办理投降的具体事宜。第十八军到长沙举行了入城仪式后，接替了长沙市的警备，日军全部放下武器向长沙市郊外集中。

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后续人员及直属部队经洪江、祁阳徒步到衡阳乘火车至长沙后，立即成立了受降组，由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为组长，第二处处长陶富业为副组长，下设三个股，由二、三、四处派课长及参谋人员、兵站司令部人员共约

* 陆承裕曾任国民党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处课长，参加了当时的受降工作。现任醴陵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醴陵市委主委。

二十人负责处理对日俘的接收工作。我当时是第二处课长，现与陶富业共同回忆受降工作的经过，概略记述如下。

对 日 俘 的 处 理

在湖南投降的日俘总共二十四万余人，分布在衡阳、长沙、湘阴、岳阳、常德等五个集中管理区，都在交通线上，对尔后迅速遣送日俘较为方便。各管理区都设有日俘管理处，由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委派主任及工作人员十余人，负责点收日俘的武器装备（马匹、车辆等军用物资，交由兵站司令部保管），按对战俘的供给标准发给补给品。各管理区都派有正规部队警备，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各区日俘都派有联络官到日俘管理处担任联络。至于日俘内部管理工作，则按其原建制自行管理，日常活动不得超出我军的警戒范围，少将以上的战俘另行集中管理，由第四方面军的调查统计室管理（调查统计室系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

总共收缴日俘各种轻重武器十七万多件（包括大小炮，不包括战刀、指挥刀），各种弹药、工兵器材、医疗器械、药品、被服装备及其它军用器材无数（当时都有验收表册，具体数字已难记忆）。还有铁道装甲车二列，汽车2800多辆及很多配件，骡马5000匹（乘马、驮马均在内）。日俘中的技术人员，如火车、汽车司机，修理人员，电厂技工，医师等等，均择优抽调出来作短暂的留用人员，后仍如数遣还。也利用过部分日俘修复公路和铁路。各地日俘逐步转到岳阳附近，从长江水道被运往上海遣送回日本。

当时，投降的日军中还夹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被日军抓夫或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编入部队（后勤部队最多）搞粮弹运输或战场抢运伤兵等艰苦劳动，所以日军称他们为“苦力”。其中有工人、农民、

士兵、小商贩、小孩，以湖北、湖南人最多（部分是武汉的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都根据他们本人的要求资遣回家了，但也有少数人不想回家，要求补入部队当兵的。这些“苦力”只是一些幸存者，过去被日军杀死、拖死、累死的不可胜数，尤以老年人遭受的虐待最惨。

此外，日军中的顽固分子，接到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之后，有放声痛哭者，有破坏火炮和焚毁汽车者，有捣毁枪枝或将枪枝投入河中者。集中后也发生过日俘强奸妇女和杀人事件，这些人都受到了惩处。

对 汉 奸 的 惩 办

日军投降后，各地维持会组织亦已瓦解。湖南省维持会长唐天德被逮捕。唐天德的父亲是湖南省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何键的基本部队第十九师当过骑兵连长，不久离去。抗日战争时期投奔汪精卫集团。湖南沦陷后，日军要他做湖南维持会长，他干过不少坏事。唐被逮捕后，平日与他沆瀣一气的人给他当说客。当时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等出面，要求释放唐天德，担保他不会逃跑。王耀武也就利用唐天德暂时担任日军联络官一知川与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受降组之间的特别翻译（一般翻译工作则选用了台湾籍人担任），翻译任务完成后仍交调查统计室关押，不能自由行动。省内其他沦陷区的市县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维持会，大多数汉奸都被捕了，先后受到惩处（判刑或枪毙），也有潜逃或勾结地方官吏而逍遥法外的，有的直到解放后镇反才归案法办。

我们对日俘中的台湾人一律以同胞对待，区别于日俘和汉奸。愿回台湾者资遣回籍，不愿回者另安排职业，或留在军队中暂时当翻译官，懂得一定技术（如开汽车、治病等）而又不愿回去的，则留作汽车司机或医生。但也有极少数人愿去日

本的。

沦陷区游击队和别动军的结局

当时在沦陷区有许多打着抗日招牌的游击队，名目繁多，情况复杂，有确系保家卫国组织联防的，有乘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有借敌后游击为名实则是打家劫舍的。日军投降后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或整编为县保安大队，或收编后补充到正规军中去，大部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都解散了，不服编遣的则作土匪论处，予以剿灭。

在敌占区活动的是戴笠的一支武装特务部队——别动军，该部队武器精良，以敌后游击为名，防共反共是实，在沦陷区征粮征税，任意捕人，勒索财物，强奸妇女，沦陷区人民恨之入骨。“宁可日本人来杀，不愿别动军来扎”，是敌后人民最普遍的怨声。日军投降后，戴笠迅速将这些别动军集中改编成了若干个交警总队。

王耀武在接收日军物资中的贪污情况

王耀武贪污舞弊的手法是很高明的，既巧妙，又隐蔽。他不亲自出面，主要由接管物资的兵站司令郑希冉主持其事。郑希冉又名郑云岳，是王耀武的山东同乡，长期以来是王耀武的军需处长。王耀武的亲信左右有八大金刚，郑希冉就是这些金刚中最红、最重要的一员。在接收日军物资和采购军粮中，据我所知，郑希冉为王耀武做了如下几件事：

一、日军在长沙的大批汽车配件材料由兵站接收后，郑希冉秘密卖给了湖南的复兴银行（数量和价值不明）。又将所接管的大批汽车除部分配发各部队外，开始是将已坏的汽车零件拆下来，以后即使尚能修理可用的汽车零件也被拆掉由郑希冉经手盗卖了。经手人之所以如此为主子卖力，因为他自己也可

从中捞一把。

二、接收的日军四艘内河航运轮船，由郑希冉押运到汉口替王耀武开设了一个运输公司。又将接收的一批电动机和其他机器，替王耀武在汉口开设了一个锯木工厂。

三、接收的日军被服仓库，内存有大批黄军呢、军毯、布匹等，除给司令部及直属队的将校军官每人发一套黄军呢制服外，其余均被盗卖，尽饱私囊。

四、日军投降后，郑借口日俘及湖南过境部队皆需粮食供应，由兵站司令部组织粮食采购委员会，以原七十四军上校军需科长唐惠明为采购委员会主任赴安乡一带湖区采购。他们多报人数，超购大量粮食，运往武汉高价出售，获取暴利。经湖区人民向省参议会揭发，赵恒惕提请王耀武查究，王为了掩饰自己，就将唐惠明立即调回。唐调回时，自恃是王耀武一手提拔的，过去又有功于王，盗卖军粮也是受王的指使，所以若无其事。次日下午，王耀武召见唐惠明，并陪唐同吃晚饭，对购粮事一字未提。唐退出后一些老同事为唐担心，便询问召见情况。唐惠明说：“司令官并没有责难追究之词，只是脸色严峻，问了家庭情况，只几句话，未及其他。”次日，王耀武突然宣布枪毙唐惠明，这一新闻轰动了长沙，也震惊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局外人称道王耀武治军严明，但王的老部下却窃窃私议，慨叹唐惠明做了替罪羊，死到临头还不知有杀身之祸。事后传闻王耀武付了唐惠明家属一笔丰厚的优抚金，送其妻回安徽老家去了。

在长沙受降后，王耀武所指挥的十八军、七十四军、一百军、七十三军等从湖南先后调往江苏、京沪一带，进行部署，抢先接收。一九四六年一月，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奉蒋介石电令集中武昌，候机空运山东济南，改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关于湖南区日俘的遣送任务，交由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

令李玉堂派部队接替，王的七十三军则集结岳阳附近待命。

（原载《株洲文史》第七辑）

衡阳抗战纪念城定名的由来

罗 铁 恕 *

抗日战争期间，衡阳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特别是衡阳四十七天的孤城苦战，两万壮士英勇牺牲，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捍卫祖国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把这光辉的历史铭刻在衡阳土地上，激励并教育子孙后代，抗战胜利之初，衡阳市参议会会长杨晓麓先生根据本市各界人士的意见，倡议要把衡阳建为“抗战纪念城”。此议在市参议会一经提出，与会者莫不赞同。但以此举需巨大物力财力，而衡阳兵火之后，瘟疫流行，继以旱魃为虐，全市人民辗转呼号，早已救死不暇，重建城市，实难胜任。而省府财力有限，对此亦无能为力。唯有吁请中央，准予兴建抗战纪念城于衡阳，建设款项由中央拨付，问题始能解决。经研究决定，以市参议会杨晓麓为首，副议长欧炳堃、参议员王炽昌、万衡、王继武等五人组成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请求国府顺从民意，准如所请。

杨晓麓等一行于一九四六年冬抵达南京，首先拜访在京湘籍知名人士及新闻界朋友，请他们在舆论上予以支持，并经商定一俟杨晋谒中央最高当局之后，再由湘籍国大代表就此事提出书面建议。于是杨晓麓就往谒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面陈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请由中央拨款事。继而湘籍名人左

* 罗铁恕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南京国防部政工局上校参谋，对“衡阳抗战纪念城”一事较了解，现任衡阳市政协委员。

舜生、胡庶华等人以国大代表身份提出：“衡阳为粤汉湘桂交通中心，在几次大会战中形成战略重镇，应先准定为‘抗战纪念城’，分令湘省府先行设计建设，并令行政院一次核发建设费”的书面建议。几经奔走，终于得到国府最高当局批准。除令行政院拨发建设复员经费暨救济物资（以工代赈）外，并令湖南省政府负责设计。经由省府派员会同内政部都市建设专家赴衡勘察。一九四七年春，杨晓麓再度晋谒国府最高当局，请求于举行命名典礼时颁发“训词”，并题颁“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当即获允。杨晓麓旋即专程赴沪，再度与行政院长宋子文及行总霍署长宝树洽商拨发经费工赈物资事宜。

杨晓麓赴京请建衡阳抗战纪念城时，请求建设费用一共是二百亿元，但在内政部决定的是由救济署拨工赈物资八百吨。等到杨晓麓返湘，湖南救济分署已无物资可拨了。直到一九四七年七月行总霍署长及联总克利扶兰署长来衡视察，经衡阳市市长仇硕夫、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面请，始拨款二亿元，发工赈物资一百吨。以如此少量经费和物资，要从废墟上把衡阳抗战纪念城建设起来岂非笑话？经市参议会缜密研讨，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建设，限于经费，一时无法进行。但可利用此有限经费及物资，先在衡阳保卫战中我军主要阵地，亦即日军两个师团曾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地方——岳屏山修建一些牌坊亭阁，为抗战纪念城命名奠基，勒石留铭，传诸后世。并按照如下设计进行施工：自山麓至山顶旧时石阶约二百余级已不能就用，应重新修筑，在山腰建一茶亭供游人憩息，茶亭之上竖一大石牌坊，石牌坊再上左右各建一“纪功亭”，亭后中央巍然矗立一块十七米高的长碑，碑上镌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颁的“衡阳抗战纪念城”七个大字。碑后修建一座纪念堂，将国民党军政要员及社会贤达二十一人题辞，分别镌刻于二十一块石碑之上，嵌于纪念堂中（题辞摘录附后）。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所在所颁“训词”里说：

“至是年（按：一九四四年）六月下旬，衡阳四邻各县，先后失陷，我第十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四十八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地方人士所以请定衡阳为抗战纪念城者，其意在此。昔者孟子言仁者无敌，又言浩然之气，集议所生，至大至刚。我中华民族所恃以生存，所资以兴立者，岂非数千年来仁义之教所沾被既深且远欤！今当举行命名典礼，爰举此义，以告国人，并示来兹。”

岳屏山上各项建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全部竣工。此虽仅为抗战纪念城一点标识，但其意义颇为深远。

一九四六年冬，以杨晓麓先生为首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一行来到南京，杨与我家世代相好。当时，我在南京国防部供职，杨等一行抵京后，他本人就在我的住处（南京太平路安乐酒家125号）下榻。因此我对杨两度来南京为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的活动情况，了解一个大概。四十年前的往事，有些回忆不清，请知情者予以教正。

最后将国民党党政要员及社会贤达为“抗战纪念城”的题辞摘录如下。

“船山尚节敦儒素，
老彭刚直矢不苟，
化为南强期可守，
不道无道期荡寇，
巍巍名城跨九有。”

（辜士钊）

“南天屏障”

（吴铁城）

“中流砥柱”

（王世杰）

“三湘保障”

（陈立夫）